

张霞 著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研究 ——以民国文坛为中心

五色石

Chinese “Freelance Writer”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Aren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霞 著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研究

——以民国文坛为中心

五色石

Chinese “Freelance Writer”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Aren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研究:以民国文坛为中心/张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61-2191-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4618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6千字
定 价 5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敦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

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衮衮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

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不仅仅是一种缅怀

——代序

李 怡

近年来，“民国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这是不是一种制造的时髦呢？我以为绝非如此，恰恰相反，它是历经种种学术变幻之后中国学人的一种难得的冷静和理性。其真正的含义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如何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当中，不是在抽象的“现代性”之中预设文学的处境而是在民国历史的具体环节中考察分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不能仅仅依赖外来的批评概念展开自己，再不能继续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如何返回历史的现场，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寻找文学自我呈现的可能，这是我们学术的新的生长点。关注“文学的民国机制”就是试图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论述“文学的民国机制”，就不得不关注其文学创作的主体——写作者，就不得不讨论民国文学创作者的主要形态——“自由撰稿人”作家。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大学与出版传媒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大生存场所。在前者，我们看到了容纳不同学说与思想的北京大学，见识了以“兼容并包”闻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与其说是蔡元培个人的仁厚接纳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人物，毋宁说就是五四文化圈多重思想倾向并存的现实扩展了这位现代管理者的思维空间。在后者，我们则看到了普遍存在的“自由撰稿人”作家群体。在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圈的背后，是历经清政府衰弱、军阀政权频繁更迭的社会政治乱局，就是这样的乱局使得从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到1914年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试图实施的出版传媒控制常常出现较多的“空隙”，而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的出版传媒的民营体制

格局与民国法律在“法理”上保护民权的相互结合更给言论自由的存在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条件，所有的这些相对有利的因素都在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生存中开始聚集起来，成为传达自由思想、形成多元化舆论阵地的重要基础。现代中国的“自由撰稿人”作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讨论现代中国的“自由撰稿人”作家，可以呈现十分丰富的内容，它背后的社会历史渊源，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它深层的精神脉络，等等。可以说，展开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书写一部全新的民国文学史论。例如，“自由撰稿人”作家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民国经济的高度民营特征，要揭示“社会历史渊源”就必须认真考察民国文学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有必要跳出阶级斗争年代的简单思维，我们发现的事实是，所谓旧中国经济薄弱、民不聊生之类的概括并不能完全解释现代中国文学，在那时，中国文学能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同样与民国时期经济形态的具体特征关系密切，例如作为文学繁荣背后的出版传播的繁荣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方式。从1913年张謇担任农商务部总长，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起，侧重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便开始建立，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高层如陈公博、宋子文等均大力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抑制政府财政支出。其间虽有孔祥熙提出以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有抗日战争时期向计划统治经济的倾斜，但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格局则基本确定。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传播业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出版传播业的民营性质虽然决定了文学的“市场利益驱动”，但读者市场的驱动本身又具有多元化的可能性，较之一元化思想控制的国家垄断，这显然更能为文学的自由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不仔细考察这一背景，就不能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真正的“经济基础”。最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民国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自由撰稿人”作家。

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杂志及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也开始改变新中国固有的“作家协会”格局，新的“自由撰稿人”作家群体重新出现，这是不是意味着“自由撰稿人”

作家的“民国意味”不复存在了呢？事情远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姑且不论当今“自由撰稿人”作家的整体数量依然有限，尚不足以撼动大局，更重要的则是精神气质的流变，在今天，能够凭借市场经济独立生存的作家常常已经为“市场”所吞噬，能够如鲁迅般昂然屹立、人格独立者能有几人？这是一种整体精神的失落，它提醒我们，对民国文学机制的考察绝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研究，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同样必不可少。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并不只有感性的缅怀，更应该包含一种深沉的反思。

几年前，在我酝酿展开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之时，张霞正好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我的建议下，她选择了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个题目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是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她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挖掘了不少的原始材料，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看法，在论文评议和答辩之中，都获得了专家们的很多嘉许，我也很为之高兴。最近几年，她又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这里出版的便是她最新修订的论文稿本，读着这些文字，我知道张霞已经找到了她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可以稳定地自我发展了，一种由衷的喜悦浮上心头，让我们一起祝愿她取得更大的成绩吧！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居

目 录

总序	杨 义(1)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不仅仅是一种缅怀——代序	李 怡(1)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发展历史	(20)
第一节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产生背景与条件	(20)
第二节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发展历程	(34)
第三节 影响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发展历程之外部因素	(42)
第二章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群体特征	(59)
第一节 “自由撰稿人”作家的职业身份自觉	(60)
第二节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生存状况	(68)
第三节 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写作特征	(83)
第三章 场域关系与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	(91)
第一节 文学场域与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	(91)
第二节 政治权力场域与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	(107)
第三节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分类与代表	(123)
第四章 鲁迅:商业性基础上的启蒙式写作	(128)
第一节 鲁迅的“自由撰稿人”作家生涯	(129)
第二节 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机智应对	(140)
第三节 场域限制下的“自由谈”杂文	(147)

第四节 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坚守	(158)
第五章 张恨水:商业化写作的典范	(172)
第一节 “自由撰稿人”作家张恨水	(174)
第二节 张恨水作品畅销原因分析	(181)
第三节 张恨水小说的商业化成功与局限	(194)
第六章 张爱玲:商业化写作的奇迹	(211)
第一节 “自由撰稿人”作家张爱玲	(212)
第二节 张爱玲走红的原因探析	(219)
第三节 张爱玲的意义	(232)
第七章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意义与启示	(242)
第一节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历史意义	(242)
第二节 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当代启示	(265)
结语	(281)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4)

绪 论

—

一般认为，自由撰稿人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由撰稿人是指以文化传媒为依托，以撰写、发表各类文章为事业追求和生活来源，同时不隶属于文化单位、传媒组织机构的自由职业者；狭义的自由撰稿人则是指“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而又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自由职业者”。^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开始出现自由撰稿人这一新的职业，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从事自由撰稿人职业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作家中也出现了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或者脱离了作协体制，或者根本就不曾加入作协或其他单位体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靠文学写作或影视写作谋生。1999 年和 2000 年，《山花》杂志两年内几乎期期推出“自由撰稿人”栏目^②，专门发表从事文学创作的有代表性的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和创作谈、生活谈。这使得自由撰稿人现象一度成为文坛讨论的热点，当代作家中的自由撰稿人、有“自由撰稿人”特征的现代作家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从事自由撰稿人职业的作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还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有关。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扩展，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① 曹鹏、张立宪编：《没有单位的记者：怎样当自由撰稿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② 两年间仅 1999 年第 12 期和 2000 年第 12 期没有开设此专栏。

内，关于自由职业群体的研究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出现^①。在这一背景之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职业作家（类似于今天被称作自由撰稿人的作家）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栾梅健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②，讨论了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在职业作家的身份转化以及获得独立性过程中的作用。该文显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现代作家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特征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陈辽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崛起、消失和新生——谈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发展历程》^③，梳理了自由职业者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作家在该文中虽被论及，但并非论述的重点。陈明远的《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④，以1928—1933年上海市市民的经济生活为参照，根据《柔石日记》、柔石书信以及许多相关作家的回忆录，描述了以柔石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尽管陈文认为柔石等左翼作家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观点有待商榷，但该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生存状况的研究，在发掘新的研究对象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发有的《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上）》，以鲁迅、张爱玲、沈从文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大批自由写作者为代表，分析他们的生存压力、精神选择、文化重负以及在物质欲望和文学理想之间、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精神辩难和艰难选择^⑤。董文桃的《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论19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⑥，从体制内作家个人化立场的丧失、自由写作者的出现与立场等方面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

总体来看，对当代作家中的自由撰稿人及有“自由撰稿人”特征的现代作家的研究尽管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对当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由撰

① 尹倩：《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② 栾梅健：《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③ 陈辽：《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崛起、消失和新生——谈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发展历程》，《江海纵横》2000年第1期。

④ 陈明远：《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期。

⑤ 黄发有：《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上）》，《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黄发有：《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下）》，《文艺评论》2001年第6期。

⑥ 董文桃：《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论19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江汉论坛》2008年第12期。

稿人尤其是有“自由撰稿人”特征的现代作家等研究对象的称谓并不统一、规范。有的称“职业作家”，有的称“自由写作者”，有的又直接称作“自由撰稿人”。这些称谓用来指称那些算得上自由撰稿人且只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都显得不够准确。（针对这一问题，本书以“‘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一概念代替“职业作家”、“自由写作者”、“自由撰稿人”等概念，来指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那些有“自由撰稿人”特征且只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有关概念的辨析及使用“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一概念的理由将在绪论的最后部分加以说明。）

（2）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当代文学范围内。由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不少作家脱离作协，成为“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当代“自由撰稿人”作家研究方面成果相对较多。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探讨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变迁对“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创作、文学观念及精神追求的影响方面。尽管“自由撰稿人”作家早在清末民初就已出现，但相对而言，研究者对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研究极为稀少，且侧重于局部研究，既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也缺乏方法论上的理论把握。

（3）大多数研究都把眼光聚焦于“自由撰稿人”作家的作品和文学追求方面，没有重视“自由撰稿人”作家的生存、写作与文学场域、政治权力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4）近年来，文学生产与制度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文学报刊在传播和塑造新文学方面的意义，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作家，尤其是“自由撰稿人”作家，其商业性写作的特征和这种特征对作家本人的生活、写作、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在文学史发展和文学制度建设方面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根据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书尝试对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展开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界定“‘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一概念，梳理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产生背景、历史发展和队伍构成，研究中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群体的身份特征、生存状况和写作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以民国文坛为中心，探讨场域因素与“自由撰稿人”作家的生存、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考虑到文学阵营、作家性别等因素，本书选取

民国文坛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撰稿人”作家——新文学阵营的鲁迅、通俗文学阵营的张恨水以及融会雅俗、在商业性和文学性两方面成就最高的女性“自由撰稿人”作家张爱玲来展开个案研究，探讨商业性写作和场域制约对他们的生活、作品、文学观念和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进而呈现民国“自由撰稿人”作家的成就与局限以及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

二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来源，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西方文论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者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发展更新。从政治标准的逐步扬弃到形式主义的审美分析再到文化研究的兴盛，现代文学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尝试，也取得了极其丰厚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话语的不断高涨，让关注文学自身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小说形式分析亦十分盛行，但随后也出现了囿于形式的游戏倾向。如何使内部的审美分析不沉溺于自身，使文学研究与更广泛的历史、文化、思想相结合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文学的日益边缘化，现代文学学科在边缘化的同时又走向了学院化、经典化；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冲击，反思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思路的兴起，以及西方汉学研究尤其是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又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边界处于不断地检讨和重构之中。在这一格局转变中，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外拓展，不断融入思想史、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的因素，出版传媒、民族国家、公共空间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焦点。直到现在，尽管仍然有不少研究者坚持文学内部的审美分析，但当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资源成为现代文学新的研究支撑点的时候，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就越来越趋向于外部研究了。

尽管韦勒克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贬低外部研究的意义，但谁也不能否认，艾布拉姆斯所指出的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个要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决定了文学研究不能完全无视文学的外部环境。后结构主义理论已经再次宣告，文本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结构，权力、欲望、意识形态等问题隐秘地交织其间。文化研究的热潮也重新激起了文学研究者对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兴趣。这样的理论背景与中国“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观念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外部研究的普遍热情。当然，这种研究倾向也与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纯粹的美学兴趣当遇到了如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对象，难免会感到失望。这不是那种经得住一再的艺术探险的文学。”^① 因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中国同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现代文学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复杂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西方的理论新潮及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向外转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就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最流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的理论、研究方法、思路的引入，有关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韦勒克所列出的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这些宏观的板块，而是触及了极为细致的层面。在文学作为艺术所包蕴的社会内涵之外，文学作为商品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开始为人们所关注。这方面探索最早的是陈平原，他在1989年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的小说研究》一书中就已经开始对文学的商品化特征进行研究。只是他的研究对象“清末民初的小说”不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所以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刺激下，对文学生产和商业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的亮点。最早的成果包括：栾梅健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②。前者讨论了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化以及作家获得独立性的过程中的作用；后者更明确地从文学生产论的角度重新定位海派作家，指出海派作家就是报刊作家，依附报刊为生，始终徘徊于文、商之间，其接受者也

① 赵园：《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

② 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主要是市民而不是学生。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在精神气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上的不同^①。吴福辉此文对期刊研究的强调，很快就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响应。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文学生产和商业机制的研究越来越热，报刊、出版乃至文学制度、文学体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就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机制研究热潮的形成而言，吴福辉的文章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其影响之下，现代文学研究突破了之前社会历史批评研究的狭小格局，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研究思路也得到了推进。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研究热潮的出现，说明研究者已经看到，决定现代文学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的，不仅只是政治、思想等因素，它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等中介因素同样在塑造着它的品质^②。但反观这一研究路向，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文学报刊在传播和塑造新文学方面的意义，而文学作为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作家，其写作的商业性程度以及这种程度对于作家的生活、创作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栾梅健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一文对此已有一定的分析，但他的研究主要还是概略的描述，在具体化和系统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掘。

三

在现代文化出版市场中，文学的传播、流通方式作为作家创作与读者消费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对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双方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文学报刊、书籍的出版、印刷、发行，意味着依附于作家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取得了物质外壳，与它的作者分离。已经出版、流通的文学作品在意义的生成方面已经与作家无关，主要依赖于读者的创造。但就商业关系而言，已经出版、流通的文学作品，其销售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作者的收入，与作者仍然有着经济上的重要联系，而这种经济关系对于作者此后的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在文学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四个环节

①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4页。

② 同上书，第225页。